

从“岁尽增年”到“岁初增年”^{*}

——中国中古官方计龄方式的演变

张 荣 强

摘 要：中国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计算方法的最大区别在增年的时间节点上。最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民间形成了以岁首元日即农历春节为节点的增年方式；官方则因应户籍制度的设计，以民众著籍亦即官府造籍的标准时间为增年节点。《史记·仓公列传》淳于意称“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岳麓秦简 0552 说爽“尽廿六年廿三岁”，都是按官方增年方式计算年龄。由于造籍标准时间不同，官方的增年时间节点也会随之变化。秦汉时期八月造籍，官方年龄就以八月增年；唐代在造籍年的前一年年末预报“来年手实”，造籍的标准时间实际上是在正月。至迟从唐代起，官方年龄已经变成了岁初增年，制度与礼俗最终合二为一。

关键词：岁尽增年 岁初增年 造籍标准时间 增年时间节点

现代中国人常用的年龄计算方法有两种：周岁是以出生时为零岁，每过一次公历生日增一岁；虚岁是出生当年为一岁，每过一个农历新年即我们通常说的春节就增加一岁。除了始生计数的差异外，两者最大区别就在增年时间节点上；由于计龄方法不同，周岁与虚岁往往相差一至两岁。^①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无论户籍档案还是其他官方文书中，原则上民众登录的都是周岁；但在民间尤其是农村，虚岁使用的场合也非常普遍。因此谈到中国人的年龄问题时，不仅外国人如堕五里雾中，中国人往往也大伤脑筋。^②

但年龄问题不仅是个人私事，它关涉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面临节点的时候，年龄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

*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孙吴乡里社会研究——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项目编号 16710221）的阶段性成果。文章草成后，承杨际平、王素、牟发松、侯旭东等先生及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 实际上，虚岁与周岁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就同一人来说，在一年不同时段里，其虚岁与周岁的对应关系是在不断变动的。春节前后出生的人在个别时段，甚至会出现虚岁与周岁相同或者虚岁比周岁大 3 岁的现象。

② 张培瑜专文讨论过今人计龄的问题。（参见张培瑜：《关于历史年代计数的规范化问题》，《历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根据百度搜索的结果，有成千上万个网帖在讨论诸如“周岁与虚岁的区别”“周岁、虚岁怎么算”等问题。

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才能入学;所以教育部下令只有当年8月31日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可以报名就读小学一年级,而9月1日出生的,差一天不满六周岁也要等到下一年方能入学。在现实社会中,除上学外,诸如结婚、就业、参军、退休等等,无不对年龄有具体要求。

现代如此,古代更是这样。在中国中古时期,^①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统治由以实现的名籍户版制作,还是被视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的赋税徭役征发,^②编民的年龄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和考量标准。如西嶋定生所谓“皇帝对民众实行个别人身支配”的秦汉时期,^③其赋役包括算赋、口赋在内的人头税和兵役、力役的征发,几乎完全以年龄为标准。即使到了中古后期,在两税法实施前以丁身为本的赋役体系中,年龄仍是最基本的征发依据。职是之故,探讨中国中古时期与人身控制、赋役征发密切相关的官方年龄的确定及其变化,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岁尽增年”与周岁、虚岁之争

明末顾炎武最早提出古代“岁尽增年”的说法,但并未引起时人重视;偶有学者谈起这种说法,也往往将其误认为周岁或虚岁的一种。因此,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古代是以虚岁还是周岁计年的问题作出说明。

现代的周岁以公历生日作为增年时间节点,自然是近代西历传入中国后的产物。中国古代实行的农历是阴阳历,每年的天数并不固定,平年和闰年甚至相差一个月。但这并不妨碍古代也会产生以农历某个时间点到下一个同样时间点为一周岁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在唐代后期的确见到了以“周岁”称呼过一岁生日小孩的事例。^④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是否存在以农历生日为增年节点的周岁计年呢?关于这个问题,从清代的学者开始就有激烈的争论。如清人钱大昕、俞樾就以贾逵所载孔子享年为例,认为古代有周岁计年的现象;^⑤但近人钱穆质疑钱大昕的说法,并举多例说明古人是以“相距之年”也就是我们说的虚岁计年;^⑥吕思勉则折衷两说,认为在上古时代流行周岁计年的现象,“历法通行后稍弃之,皆以相距之年计矣”。^⑦

① 本文的“中古时期”,是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2页。

③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序章”,第34页。

④ 白居易《金銮子晬日》一诗云:“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生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参见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第480页)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周岁”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出现得更早,《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北海王传》元详向孝文帝上疏中,就有“谨寻夺禄事条,班已周岁”一语;同书卷59《刘昶传》记载刘辉与兰陵长公主离婚后,亦谓“公主在宫周岁”云云。(《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1312页)

⑤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43页;俞樾:《九九消夏录》,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4页。

⑥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1《孔子卒年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59页。

⑦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6—269页。近年也有学者对古人周岁计年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基本上是沿袭前人说法。(周国林:《古代计岁法略说》,《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王佳伟:《古人年龄都是以虚岁算的?》,《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1期)一些治秦汉史的学者也认同当时有周岁计年的做法,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高敏及黄今言等人根据云梦秦简《编年记》“今元年,喜傅”的记载,提出“喜”十七或十五周岁傅籍的说法。(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

远古时代的人是否有周岁计年的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秦始皇十六年（前 231）“令男子书年”开始，^①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颁布《户籍法》之前，官府的户籍和档案只记载民众的生年或年龄，不记出生的月和日。^②所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里不可能出现周岁计年。官方层面如此，民间习俗又怎样呢？生日计年的前提是民众普遍有了生日记忆尤其是重视生日的意识。有关古人过生日的问题，古今学者已有充分论述；^③大致说来，南北朝后期民间出现庆祝生日的现象，唐玄宗之后生日过寿的风气流行开来。按道理说，随着生日祝寿的盛行，民间也应该出现生日增岁的观念。但事实上，唐宋之后的绝大多数民众只是将生日作为个人的节日，在这一天庆生祝贺，并没有把生日作为增年的节点。^④所以，除了特指刚满岁的婴儿外，我们在明清文献中偶尔见到以周岁计年的事例，适用的对象也都是小孩。^⑤与之相反，以虚岁计龄的现象则是常态，即如下面提到的顾炎武、陈澧等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生日计年的现象存在。而民国教育部 1930 年下发的《就旧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⑥

明白了古人的计年方式，我们再来看顾炎武的命题。顾炎武在《日知录》卷 32《岁》中提出了古人“岁尽增年”的说法，他说：

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⑦

淳于意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医生。汉文帝下诏询问他一些问题，他向文帝上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年

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释文·注释”，第 9 页；高敏：《关于秦时服役者年龄问题的探讨——读〈云梦秦简〉札记》，《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6—25 页；黄今吾：《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 1 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1—82 页）张金光则对此给予了批评。（参见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11—212 页）

①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32 页。

② 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4 期。

③ 最新研究成果参见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一文。有关生日问题的研究史，亦可参看文中相关论述。

④ 今天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中仍是如此。

⑤ 我们在明清时期的民间医方、私人书信及民间故事中，可以见到小孩用周岁计年的例子。如《普济方》卷 373《婴孩惊风门》提到乳麝丸的用量时，说“三周岁以下小儿一饼，一周岁下半之”。（参见朱橚等编：《普济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年，第 446 页）邓原岳给门人舒孺立的信中写道“小儿生已十二周岁”。（邓原岳：《西楼全集》卷 18《尺牍·与门人舒孺立编修》，明崇祯元年邓庆采刻本，第 4 页 a）冯梦龙讲的《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说杨八老人赘蔡家，“不觉住了三年，孩儿也两周岁了”。（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 18《杨八老越国奇逢》，许政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258 页）民间之所以出现儿童用周岁计龄的事例，我想，除了受“抓周”之类风俗的影响外，恐怕也和他们正处于快速生长阶段，虚岁难以反映其个体生理、心智水平的实际差异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差异越来越小，人们就又回到虚岁计龄的习惯上来。现在河北、河南农村，人们称三、四周岁以内的小孩也经常用周岁，过了这个年龄就不再用了。

⑥ 《就旧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浙江省教育行政周刊》1930 年第 36 期。20 世纪 50 年代，姜亮夫修订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收录上古至 1919 年以来 12000 人，其在《订补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序例》中也指出，“碑传书年及生卒常例都用虚数，生的那年即算一岁”。（参见姜亮夫纂定：《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陶秋英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 页）

⑦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811 页。

龄,说他“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顾炎武仅据淳于意一语,就得出了古人“岁尽增年”的结论,可谓卓识。但钱大昕不同意顾炎武的说法:

绛县人生于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当为七十四年。而传称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岁为一年。绛县人生正月甲子朔,于周正为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于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贾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岁故,与绛县人记年一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盖仓公生于冬末。顾亭林谓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年,亦无它据。^①

钱大昕举出绛县老人和孔子年龄的例子,认为古代实行周岁计年,怀疑淳于意也属于此类。钱大昕所举这两个例子,是学者持“古人周岁计年”说的主要论据。“绛县老人疑年”的典故出自《左传》襄公三十年称绛县人“不知纪年”,只知自己“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师旷推算出他生于“鲁叔仲惠伯会郯成子于承匡之岁”即文公十一年(前616),时年七十三岁。绛县老人的出生日期比较特殊,他的生日“正月甲子朔”即夏正的岁首。这样,周岁、虚岁的增年节点在同一天;但在计龄上,周岁因为不算出生的这一年,就比虚岁少一年。到鲁襄公三十年(前543)二月,表面上已经过了岁首和绛县老人的生日;但当时行周正,三十年二月即夏正的二十九年十二月,实际上距岁首和绛县老人的生日还差几天。所以按照周岁算,绛县老人只有72岁;师旷说的73正是虚岁即加上出生那一年的算法。^②至于孔子的年龄,古今学者分歧都很大。孔子的生年有两说,《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谓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晚一年。目前学术界更倾向于司马迁的说法,^③谓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至哀公十六年(前479)卒,也正好是虚岁73。

钱大昕认为“古人以周一岁为一年”即周岁计年,没有说明什么理由。这恐怕和他所处生日祝寿风气盛行的时代有关。^④年代稍后的陈澧就讨论过生日祝寿和周岁计年的关系,他在《东塾集》卷4《与人论祝寿书》中说:

自唐以来,以生日祝寿,澧尝推其故,当由尔时人之纪年以生日为增一岁,故于是日行此礼。今人既不以生日增一岁,则此礼不必于生日行之。今京官多择日为亲寿者,不知起自何时?近者平定张穆为《亭林年谱》,考亭林之母六月二十六日生日,而称觞乃在五月朔,盖即生日不受贺之义。然则亭林固已择日为母寿矣。^⑤

陈澧字兰甫,是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按照他的说法,清代的人没有生日计岁的习惯,甚至当时存在着择日祝寿的现象。这种说法也和前引顾炎武“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相呼应。但

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37页。

② 北周时期的数学家甄鸾在《五经算术》卷下《推绛县老人生经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中对绛县老人的年龄作过详细推算,算出的结果是差3天不到73岁,并解释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为七十三年。据多而言也”。(参见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79页)甄鸾用数学方法推算年龄,算出的只能是周岁;而其又以四舍五入法来弥合“七十二岁”和“七十三岁”的差异,更不合常识。

③ 如现代一些学者提倡的“孔历”即以鲁襄公二十二年作为元年,近来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之所以在公历9月28日举行,也是根据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的说法换算来的。

④ 有关明清江南做寿之风,参见邱仲麟:《诞日称觞——明清社会的庆寿文化》,《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3期,2000年;后收入蒲慕州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51—494页。

⑤ 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册,第158页。

是陈澧怀疑唐代之所以兴起生日做寿，是由当时生日计岁的做法导致的。我们知道，唐代中期朝野上下开始流行生日祝寿，主要是受了唐玄宗设立诞节的影响；从逻辑上说，生日计岁也只能是在民众有了生日祝寿的活动后出现的，不可能相反。无论唐代还是此前，我们在官方或民间记载中都见不到生日计岁的做法。所以，同时代的文廷式对陈澧的说法提出质疑：

陈兰甫师《东塾文集·与人论祝寿》一篇……云“自唐以来以生日祝寿，澧推其故，当由尔时人之纪年以生日为增一岁”，则恐未然也。《魏志·朱建平传》云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转差，垂以平复，三十日日昃，请纪纲大吏设酒，曰“吾所苦渐平，明日鸡鸣，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过矣。”疾动，夜半遂卒。是古人岁尽增年之证。白香山《七年元日对酒诗》云：“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闻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元微之《除夜酬乐天》云：“莫道明朝始添岁，今年春在岁前三。”是唐人亦以岁尽增年也。^①

文廷式举的朱建平例子，见于《三国志》卷29《方技·朱建平传》。传称朱建平预言夏侯威49岁有劫，但如果能顺利度过这一年，就可以活到70岁；结果夏侯威死在了49岁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的半夜），最终没能熬到50岁（即第二天元旦鸡鸣时分）。这是三国时期的例子。元稹、白居易的酬唱诗进一步表明，即使唐代后期的人也是以元日作为增年的节点。奇怪的是，无论《魏志·朱建平传》还是白居易、元稹的诗，明显说的都是“岁初（首）增年”；但文廷式全部将它们视作“岁尽增年”的例证。大概在他的意识中，当年年末和第二年岁初首尾衔接，所以就把“岁尽增年”和“岁初增年”混为一谈了。^②但顾炎武说的“岁初”和“岁尽”是就同一年的岁首、年末而言，这就不是相邻的时间段，而是差了一年的时间。

看来，无论顾炎武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都没有真正理解“岁尽增年”的说法，“岁尽”的涵义到底指什么？遗憾的是，顾炎武没有作出进一步解释。

二、“岁尽增年”与“著籍增年”

钱大昕批评顾炎武仅以淳于意的例子立说，没有其他证据。2009年，陈松长介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时，披露了一枚编号为0552的简文：“爽初书年十三岁，尽廿六年年廿三岁。”^③简0552的说法与淳于意的表述如出一辙。陈伟根据这枚简的内容，确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记载的准确性。^④我们感兴趣的是，爽秦始皇十六年13岁；按照传统的算法，其进入秦始皇二十六年就是23岁，简文为什么说“尽廿六年，年廿三岁”呢？

“尽”，《小尔雅·广言》：“止也。”《玉篇·皿部》：“终也。”其常与日、月、年等时间词连用，表示一个时间段的结束。这种用例在秦汉简牍中极为常见，如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

1. 有米委赐，粟禾稼公，尽九月，其人弗取之，勿鼠（予）。
2. 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粟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
3. 日食城旦，尽月而以其余益为后九月粟所。城旦为安事而益其食，以犯令律论吏主

①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3，《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65册，第75页。

② 事实上，即使在岁末年初首尾相连的情况下，在以元日为增年时间节点时两者仍有实质区别，所以民俗对除夕之夜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形象说法。

③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④ 陈伟：《岳麓书院秦简考校》，《文物》2009年第10期。

者。减春城旦月不盈之粟。

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均有“以四月尽六月”授夏衣、“九月尽十一月”授冬衣的规定。这里的“尽月”、尽某月，都是到月底的意思。而里耶秦简“卅年十月尽九月，群往来书已事仓曹□简”（简8—1777+8—1868），^①居延汉简“肩水候官地节三年十月以来尽四年九月吏卒廩食名”（简13·1）、“建昭元年十月尽二年九月大司农部丞簿录簿算及诸簿十月旦见”（简82·18B）此类记载，^②正是秦汉“计断九月”即以当年十月初至来年九月底为一财政年度的直接体现。

淳于意“年尽三年”的“三年”，顾炎武提出原文脱“十”，应该是汉文帝十三年（前167）；^③梁玉绳坚持就是汉文帝三年。^④无论如何，这条材料与简0552都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前221）之后到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前104）之前这段以十月为岁首的事。十月为岁首，“岁尽”应该指九月或与之相近的时间。对当时人来说，这一时间段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古代官府是通过户籍掌握民众年龄，户籍上的年龄原则上先由民众自行申报。根据早期帝国的法律，民众只有在每年造籍的时候向官府申报年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说：“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母、同产为占者，吏以□比定其年……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又说：“恒以八月令乡部嗇夫、吏、令史相杂案户，户籍副臧（藏）其廷。”“户时”也就是每年的八月。民众申报年龄后，官府经过核实再登到户籍上。这是西汉初年的史料，但八月造籍的做法显然是沿承秦代，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就有：“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傅”即傅籍，“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⑤这里还是说奴婢的著籍时间，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8—731：

□八月□□□

□春乡户计。□

（背）：

□以邮行，不求报，敢言之。□^⑥

里耶简中常见“貳春乡”。推测简文的意思，当是貳春乡在八月造籍结束后，向县署呈报所辖的户口数。里耶秦简的年代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⑦而根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如下所说，官府造籍通常要持续两个月的时间，秦始皇之所以在九月下令，恐怕也与此时正在编造户籍有关。这样看来，八月造籍的制度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⑧

① 该简出土时断为两截，此处录文据陈伟缀合的结果。（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9页）

②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145页。

③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1527页。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3《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8—1369页。

⑤ 《汉书》卷1上《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⑥ 录文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11页。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页。

⑧ 这显然和当时的计帐年度有关。有迹象表明，战国时期就已采用“计断九月”的制度，参见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收入《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7—221页。计簿所载各种数据截止到当年的九月，八月开始编造户籍，九月底造完，正好可以保证户口数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到当年的计簿上。

上引张家山汉简说“户时占其□”，同出《户律》又说“八月书户”。造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民户占年、官府案比、编定户籍等一系列活动，八月不过是编造户籍的起始时间。什么时候结束造籍呢？我们知道秦汉“计断九月”，计簿记载的包括户口统计在内的各种数据截止到当年的九月，为计簿提供户口数字的造籍作业就必须在九月底前完成。^①下文第五节所引里耶秦简 8-183+8-290+8-530 提到第二年年初（10 月 4 日），迁陵县已经做好上一年的户计；另一枚走马楼汉简也说本年年末（9 月 17 日）审核完了当年都乡的户计，皆可证明这一点。秦及汉初八月造籍，九月结束，其时已经到年终岁尾，所以《管子·度地》篇引述当时的造籍法令，说“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②就把造籍时间说成是“秋岁末之时”。

如果以上论证仅能说明“岁尽”与造籍时间重合，未能确证两者就是指同一件事的话，我们不妨再来看睡虎地《仓律》的规定：“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秦代按身高标准将刑徒分为“小”“大”两种课役身份，并据此发放不同的口粮数，同出《仓律》就有“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的规定。“八月傅为大隶臣妾”，就是说小隶臣妾并非在岁初，而是要等到八月著籍后，在官府看来才算完成了向大隶臣妾身份的转换。以身高为标识的战国时代如此，到了以年龄为标识的秦汉时期也是这样。《续汉书·礼仪志》“案户条”：“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案比”就是造籍。高年授王杖、糜米的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初年。^③“年始七十”云云，也明确是说将著籍作为增年之始。

我们知道，户籍登录的数据反映的是一个特定时间点的情况。秦汉八月造籍，八月即造籍的标准时间，^④也就是说，民众要以当年八月的户口数据为标准，将之申报并经官府案实后登录到户籍上。而从官方操作的层面上看，这些数据也只有在著录户籍后，才能成为官府征免赋役、定罪量刑、赐廩养老的依据。前引睡虎地《仓律》、《续汉书·礼仪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样，著籍时间事实上就成了官方年龄的增年节点。换句话说，官方年龄的增年节点不是以传统的岁首为标志，过了这一天就增一岁；而是以著录到户籍上的时间，也就是造籍的标准时间作为一岁的开始，^⑤简言之即以著籍为增年的标志。在每年造籍的情况下，民众的一岁实际上就成了两个相邻著籍时点之间的时段。^⑥

① 参见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收入《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 67—88 页。

② 秋季与岁末相连，可见这条法令讲的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事。

③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就记载了官府根据爵位对老年人廩米、授杖的规定。这里的“二年”，学界通常认为是指吕后二年（前 186）。（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57 页）

④ 本文所用“标准时间”，借鉴的是现代人口统计学上的术语。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就是说此次登记的人口及各种特征反映的都是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的情况。通过这个时间，所有普查员普查登记完成后，经过汇总就可以得到 2010 年 11 月 1 日全国人口的总数和各种人口状况的数据。古代当然不可能这么精确，不过具体到月罢了。

⑤ 造籍与著籍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对官府是造籍，民众就是著籍。实际操作中，每个民户具体著籍时间也会有差异，早的在八月初，晚的可能要到九月了。这里说的著籍时间指的也是造籍的标准时间。

⑥ 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编号为 8-550 的简：“媼皙色，长二尺五寸，年五月，典和占。浮皙色，长六尺六寸，年卅岁，典和占。”（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 178 页）简文既登记年龄，又登记身高。而媼的年龄被里典占为五个月，其意恐在强调年龄与身高的对应关系，但户籍正式登录时

汉代八月造籍的说法,除上引《二年律令》外,也见诸汉人注疏以及东汉时期的史料。看来,整个两汉时期官府皆在八月造籍。^①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这段时期,造籍时间在八、九月,故民众是“岁尽增年”。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后,造籍时间没有变化;但正月成了岁首,就不能再说“岁尽增年”了。

三、古代礼俗上的“岁首增年”

中国古代官方年龄因应户籍制度的设计,采用的是著籍增年的方式;《史记·仓公传》记录的是淳于意向皇帝的上书,^②岳麓简 0552 提到的“爽”应该是一位官吏,^③所说的年龄都是官方的算法。但在民间习俗乃至国家礼仪层面上,并非如此。

户籍上的年龄来自于民众“自占”,民间计年当然出现得更早。有了计年,就一定有增年的节点。我们知道,上古时代的先民在没有掌握历法知识之前,通常是根据自然景物的变换尤其是农作物的成熟、收获周期来纪岁(时间)的。所以卜辞中的“年”从禾从人,《说文》训为谷孰(熟),^④其表示一个时间周期也是“取禾一熟”之意。^⑤这在上古时代的文献中也有反映。《诗经·豳风·七月》描写十月的风俗时,说“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说此时“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对华北黄河流域来说,这个时节农作物收获完毕,旧的农业生产周期已经结束,新的生产周期即将到来。所以当时的人们把十月作为一岁之始,举行盛大的节日仪式,大家互相祝贺长命百岁。这种饮酒贺岁的热闹场面和后世元旦的情景几无二致。

《诗经》反映的是上古的情况,随着历法知识普及,增年的节点就与天文历法联系起来。按照《史记》卷27《天官书》的说法,在秦汉尤其汉武帝以后的岁时节日中,有四个与岁首有关的日子:“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⑥冬至日、腊明日、正月旦以及立春日都可以视为一岁之始。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冬至是阴阳交替、昼夜消长的关键,是历法之始。腊明日即腊日的第二天,应劭说“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⑦腊日的第二天称为“初岁”或“小新岁”。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也是一年四季的开始。立春日更多情况下是官方举行祭祀、迎春活动,^⑧民众在冬至、腊明日也会“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但其热闹、隆重程度远比不上“正月旦”。崔寔《四民月令》“正月”条详细记载了正日的习俗:

只能注“一岁”。

- ① 相关论述,参见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后收入《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222—266页。
- ② 《史记·仓公传》“臣意”云云,“臣某”为古代臣民向皇帝上书的自称。(参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1—118页)
- ③ 据陈松长介绍,岳麓秦简中有两枚简记载“爽”在秦始皇二十四、二十五年先后担任过“司空史”、“令史”,参见前揭《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一文。
- ④ 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卷7上《禾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46页上栏。
- ⑤ 《太平御览》卷17《时序·岁》引《尔雅》郭璞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册,第88页上栏。
- ⑥ 《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40页。
- ⑦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8《祀典·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9页。
- ⑧ 《淮南子·时则训》、《续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迎岁于东郊”。

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觴举寿，欣欣如也。^①

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也说“正元日，俗人拜寿，上五辛盘、松柏颂、椒花酒、五熏炼形”。^②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祭祀祖先、饮酒祝寿等，但元日饮酒的方式非常独特，根据崔寔描写的场景：“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③《李膺家录》记载一个具体事例：“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④年少较年长者先饮的做法，显然不合尊老敬长的传统礼仪。为什么元日有这种特殊习俗呢？西晋时人董勋有个解释，《太平御览》卷29《时序·元日》引《时镜新书》：

晋海西公又问董勋曰：“俗人正日饮酒，先饮小者，何也？”勋云：“俗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⑤

元日对老、少群体有着不同涵义：对年轻人来说是年龄增长一岁，对老年人就是寿命减少一岁。年少先饮的做法体现的是对年轻人成长的羡慕与庆祝，但无论先饮、后饮，反映的都是时人岁首增年的习俗。

汉代民间有元旦贺岁的风俗，朝廷元日的礼仪更为隆重。《太平御览·时序部》引应劭《汉官仪》卷下：“元日朝贺，三公拜壁殿上，献寿觴。”^⑥《续汉书·礼仪志》记载更为详细：“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贺，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觴御坐前。”^⑦朝廷在元日举行盛大庆典的初衷，无非是为了给皇帝献酒贺岁。^⑧因为朝野上下都有元日增岁的习俗，汉代的冠礼通常也是在正月举行。^⑨

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后，以正月为岁首，民间是以元旦为增年的节点。在此之前，很难说就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在秦统一至汉初这段时期，以十月为岁首，但没有改变正月。《史记·天官书》称元旦为“四始”，^⑩在这一天通过占风卜问一岁之美恶；睡虎地出土的《日书》揭示当时人仍是在正月朔日卜问年景、有无战争；^⑪前引《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的故事中，绛县老人

①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② 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5《元旦上》“五辛盘”条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79册，第54页。

③ 案《太平御览》卷29《时序·元日》引《四民月令》，记腊明日习俗时亦有“进椒酒从小起”之语。石声汉指出，此系《太平御览》转引自《荆楚岁时记》，而后者在抄引《四民月令》时将“元日”“腊明日”内容相混致误的结果。（前揭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第75页）

④ 《太平御览》卷29《时序·元日》引《李膺家录》，第1册，第138页下栏。

⑤ 《太平御览》卷29《时序·元日》引《时镜新书》，第1册，第138页下栏。

⑥ 《太平御览》卷29《时序·元日》引《汉官仪》，第1册，第135页下栏。

⑦ 《后汉书》附《续汉书志》第5《礼仪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30页。

⑧ 东晋的成帝曾说，元日之礼“事之大者，不过上寿酒，称万岁”。（《晋书》卷23《乐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8页）

⑨ 《后汉书》附《续汉书志》第4《礼仪志上》，第3104页；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第6页。

⑩ 司马贞《史记正义》谓：“正月旦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史记》卷27《天官书》注引，第1340页）

⑪ 如“正月以朔，善，毋（无）兵”，“正月以朔，旱，又（有）小兵，毋（无）大兵”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第185页）

出生的时间正好是正月初一。种种迹象表明,以元旦为增年的习俗可能要追溯到更早。

无论如何,从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元旦作为年首大节,一直是以民间增年时间节点的形象出现的。无论是南北朝时期庾信元旦赋诗“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时的喜悦,^①还是唐代白居易除夕夜发出“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的感慨,^②都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旧时民间除夕贴挂“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对联也一直沿用到现在。^③

四、唐代的手实申报与岁首增年

古代官方年龄采用的是著籍增年,但不同朝代的造籍时间,准确地说是造籍标准时间不同,官方增年的时间节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魏晋南北朝史籍中,很少有户籍制度的记载。前引《三国志·朱建平传》提到夏侯威的事可以作为岁首增年的例证,但我们知道占卜本就是民间流行的方术,这种增年方式恐怕仍属民间的习俗。除此之外,《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曹叡享年36岁,裴松之对此提出异议:

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曹叡生于建安十年(乙酉,205),死于景初三年(己未,239)正月,^④粗算起来享年35虚岁。但明帝景初元年改以建丑月为正,三年正月实为夏正的二年十二月,严格计,其享年不过34岁。有关魏明帝享年的差异可置不论,我们注意到,裴松之在讨论增年时都是以岁首为节点计算的。但我们不确定这是南朝官方还是民间的做法。

北朝史籍涉及造籍日期的记载有两处。一是根据《魏书·高祖纪下》的说法,北魏孝文帝改制时编制户籍的时间在二月,这显然是指整个造籍程序启动的时间。二是《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年间,文帝接受高颎的建议,“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如下所述,诸如貌阅(团貌)、定户等都是基于民户手实进行的,则民户申报手实的时间至少是在正月初,更可能是上一年的年末。传世文献之外,我们见到十六国时期注明造籍日期的户籍实物有三件:《前秦建元廿年籍》是三月造籍,^⑤《西凉建初十二年籍》正月造籍,^⑥《北凉承阳二年籍》十一月造籍。^⑦这几件户籍中标注的日期也指的是造籍的标准时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制度的制定又有其偶然性;但就以上有限材料推断,这一时期的造籍日期基本上是围绕着岁末年初这段时间来进行的。

①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4《正旦蒙赵王赉酒》,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册,第343页。

②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28《除夜》,第3册,第1971页。

③ 相传此联为明代嘉靖年间的状元林大钦所作,参见顾鼎臣、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3“状元林大钦”条,汉阳叶氏平安馆藏本,第8页b。

④ 由于大小月天数、正朔及置闰的不同,皇帝年号与公元纪年并非一一对应,有时一个皇帝年号可以对应两个公元纪年,反之亦然。本文在讨论具体日期的差异时,往往会在帝王年号后同时标注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

⑤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6—179页。

⑥ 录文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录文与插图”,第3—5页。

⑦ 录文见 T. Yamamoto and Y. Dohi, eds.,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A) Introduction & Texts, Tokyo: The Toyo Bunko, 2001, p. 9.

关于唐代的造籍日期，史籍有明文规定。《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

《唐会要》卷85《籍帐》记载更详细：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三月三十日纳讞，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所须纸笔装潢，并皆出当户内口，户别一钱。”

唐前期户籍三年一造，编造时间从造籍年的正月初开始，三月底结束。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唐六典》、《唐会要》“造籍起正月”云云，这里的“正月”是指县司赴州正式造籍的时间，和前面说的汉代八月造籍是从民户自占年算起不一样。我们知道，唐代从民户报手实后，还要经过里正汇总上报，县令貌阅核实、定户等基础作业，才能进入正式造籍的环节。如果正月上旬正式造籍，民户报手实的工作至少要提前到上年年末完成，所以《新唐书》卷51《食货志》就说：“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学者对“乡帐”的性质有争论，但对岁末报手实这点异议不大。这里的“岁终”也是个笼统的说法，有迹象表明，民户申报手实的时间甚至要早到十一月份。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入藏一批吐鲁番文书，其中一件整理者命名为《十一月十五日交河县帖盐城为入乡巡貌事》，根据张铭心的介绍：

（该文书）是交河县下发给盐城的一件关于“入乡巡貌”的帖式（下行）文书……文书中首先书写了八十名需要被核实户口的人名，然后书写了命令城主于当月十七日“火急点检排比，不得一人前却，中间有在外城逐作等色，仍仰立即差人往追”等内容。^①

县令十一月十七日到盐城貌阅，显然民户此前已经报完手实。县令在貌阅手实后，接着要做的工作就是定户等。日本《令集解》引唐令说：“收手实之际，作九等定簿。”^②“九等定簿”就是唐代的户等簿。《唐六典》卷30“京畿及天下诸县令”条说：“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定户等的时间，《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有明确规定：“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县令必须在造籍的前一年完成定户等的工作。而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表明，^③蒲昌县定完户等的时间在十二月十五日。可以反推，民户申报手实的工作至少十二月上旬就完成了。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民户申报手实的时间也就是造籍的标准时间；唐代的手实要在上年年末申报，那以此为基础编造的户籍不就是以上年年末为标准登录的？这不又成“岁尽增年”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看吐鲁番所出《唐残手实（二）》，其牒尾曰：

3 牒被责当户来年手实，件通如前，无有加减；若后虚妄，求依法□罪。谨牒。^④

① 张铭心：《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新资料》，《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6日，第11版。

②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令集解》卷14《賦役令·應役丁條》，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423頁。

③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1—312页。

④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残片拆自阿斯塔那152号墓内女尸纸鞋，其中有纪年者为唐贞观十九年（645）。在两件明确为贞观年间的手实中，也有类似的保证词，《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手实一》：

11 来年手实，具注如前，并皆依实

《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手实二》：

8 通当户来年手实， 具注如前，并皆依 实，

9 妄，依法受罪。谨 牒。

贞 年 月 日户^①

文书说得很清楚，年末所报手实上登录的不是当时数据，而是预报的来年情况。所以唐代户籍仍应视作以正月为标准登录的。

但我们也见到了正月报手实的例证。唐前期有两件手实注明了民户申报时间，其中《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末尾标明的时间为：“载初元年一月 日”。^② 宋家钰认为这里的载初元年（690）一月实际上应是正月，也就是永昌元年（689）的十一月。^③ 但我根据武则天《改元载初敕》的记载，并结合诏书从洛阳传至高昌需要的时间，指出《宁和才等户手实》所署的载初元年一月，只能理解成诏令中所说的“来年正月”即载初改元之后的第三个月（庚寅年正月，公元69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绝不会是载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己丑年11月，公元689年12月18日至690年1月15日）。^④ 近年出土的《唐秦举墓志》中也有“载初元年岁次庚寅一月己卯朔四日壬午”的记载，^⑤ 而载初元年正月（永昌元年十一月）是庚辰朔，^⑥ 载初元年的第三个月即庚寅年正月才是己卯朔。此足以证实我的观点。为什么这件手实是正月申报的呢？前文提到，唐代前期“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载初元年为庚寅，是非造籍年；既然年末报手实是为了赶上第二年正月造籍的提前作业，而这一年无需造籍，本应以正月为标准登录的手实自然就不用提前申报了。也正因为《宁和才等户手实》是年初申报，所以该文书第8片第4行有“男思安年壹岁”等字样，而这在唐代户籍中是不可能出现的。^⑦ 这

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3），第498—516页。原文书用武周新字，径改。另一件《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注明申报的时间是九月，该件手实申报的背景比较特殊，下文也有分析。

③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8—101页。孟宪实也赞成宋家钰的说法。（参见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④ 参见张荣强：《唐代造籍日期辨正》，《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后以《也谈唐代的造籍日期问题》为题，收入《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267—276页。

⑤ 赵君平、赵文成编著：《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278页。

⑥ 《旧唐书》卷22《礼仪志二》：“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64页）《资治通鉴》亦载“天授元年（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庚辰朔”。（《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2页）

⑦ 《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中也有一岁的登录：第5片第9行“男屈知年壹 黄男”，第6片第1行“女端莫年壹 黄女”（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2），第46、47页）。该手实是在贞观十四年八月唐朝攻灭高昌国之后不久，为对高昌旧境实行有效管辖而进行的人口统计。民户申报的时间是在九月，其所申报的数据为当时的情况；既非年末申报，亦非为来年造籍服务。

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唐代三年一造籍，每年都要报手实，从工作频率上讲，或许正月报手实才是常态。^①

唐代不仅民户籍，其他特殊身份的籍也是以正月为标准登录的。当时有官奴婢籍，据大历十四年（779）八月都官上奏：“伏准格式：官奴婢，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并每年置簿，点身团貌，然后关金、仓部给衣粮。”^② 池田温对比日本保留下来的养老令条文，指出早在永徽年间，官奴婢以及官户就是正月造籍。^③ 《唐会要》卷49《僧籍》也提到僧籍的编造，“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州县，一以上祠部”。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一件定名为《唐龙朔二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文书，龙朔二年是壬戌年，也是官府编造民籍的年份；其注记的“正月”云云，说明唐代编造僧籍的时间也是以正月为准。^④ 户籍制度的设计是著籍增年，唐代造籍的标准时间是正月；看来从唐代开始，官方的增年方式已经变成了“岁初增年”，制度与礼俗最终实现了统一。

五、秦汉与唐代官方年龄及户籍记载的差异

无论秦汉还是唐代，其赋役征除、赐廩养老、定罪量刑等等都是以官方年龄为据。唐代的著籍时间与民间的增年节点一致，无所谓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但秦汉时期就不同了。

秦汉时期户籍上的年龄来自民众自占，但民间是岁首增年，官方八月著籍增年，这就使官府掌握的民众年龄比民间的虚岁“慢一拍”。我们看一下新生儿的著籍情况。按照民间计岁的习惯，小孩出生就为一岁，如果是八月以前出生的，他在当年著籍时被注为一岁；若是八月以后出生，赶不上当年造籍，一转年他就两岁，该年八月著籍时记为两岁。直到下一年再造新籍，官方才掌握并使用新一轮年龄数据。如果不考虑新生儿的情况，官方与民间因增年时间节点导致的年龄差异就是：在每年八月造籍前，官方掌握的年龄比民间的虚岁小一岁；八月造籍后，官方就与民间一致了。明白了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我们就可以解释史籍中记载的汉代人年龄的一些疑问了。例如，《魏志·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曾提到他自己的早年经历，说建安二年张绣反叛，“时余年十岁，骑马得脱”。徐绍桢《三国志质疑》提出疑议：“据本纪，文帝生于中平四年冬，而张绣既降复反，事在建安二年春，上距中平四年已十一年，而《典论》自云十岁者，盖自中平四年之冬距至建安二年之冬，始实周十岁也。”^⑤ 但张绣反叛的时

① 金代户籍制度仿照唐代，《金史》卷46《食货志一》载：“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2页）这里说的是手实与计帐的关系，但也可以看出在非造籍年，手实都是正月上报。

② 《唐会要》卷86《奴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60—1861页。

③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02页。

④ 参见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这件僧籍标明的“正月”，指的也是造籍的标准时间。正常情况下，其与申报手实的时间是一致的。2006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607号墓出土了一件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开觉寺的手实，其申报的时间就是在正月。（参见《唐神龙三年正月高昌县开觉寺手实》，收入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3页）

⑤ 张舜徽编：《二十五史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册，第945页。

间是在春季，没有到曹丕的十月生日，其说的十岁显然不是指周岁。《典略》是曹丕的自述，他记自己的年龄不应该有错。如何理解曹丕这里说的十岁呢？曹丕生于中平四年（187）冬，第二年八月他完成第一次著籍时是两岁；到建安二年春，当年的著籍时间还未到，按照官方的统计标准，曹丕应该就是十岁。

表面上看，秦汉时期官方八月增年，民间岁首增年，官方年龄只比民间年龄晚了八个月。但正如上文所说，八月仅是民众申报年龄的开始，官府只有等到造籍结束才能确认民众年龄，并据此开展一系列活动。所以睡虎地秦简《仓律》谓“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官府按照户籍上的年龄赐给廩食只能是十月之后的事了。这样，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上讲，秦汉的官方年龄就比民间年龄差了将近一岁（十个月）。对比一下汉人和唐人的处境，即使汉代和唐代规定的各种权利、义务的年龄一致，汉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时间也要比唐人晚了将近一年。

秦汉和唐代同样是著籍增岁，但由于造籍时间不同，这就使得二者户籍上登录的年龄数据有不同含义，记载形式也有区别。

秦汉时期民户自占的时间在八月，这也是造籍的标准时间，所以户籍上登录的年龄就是当时的数据。这可以纠正笔者一个错误认识。笔者曾根据睡虎地《仓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的记载，结合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手实牒尾“责当户来年手实”之语，推测秦汉户籍中记载的年龄不是当年八月的数据，可能是下一年的预计。^① 这种解释似乎疏通了《仓律》的文意，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如果户籍预报的是来年数据，在此基础上做成的各种户口统计也只能是来年的情况了。但新近江陵松柏1号墓出土一批汉武帝时期的简牍，其48号木牒为：

• 二年西乡户口簿 （上栏-1）

户千一百九十六

息户七十

耗户卅五

相除定息卅五户

大男九百九十一人

小男千卅五人

大女千六百九十五人

小女六百卅二人

息口八十六人 （下栏-1）

耗口卅三人

相除定息口卅三

• 凡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②

“息户（口）”、“耗户（口）”分别指与去年相比，繁衍滋生和减耗的户、口数。除此之

① 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载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后以《孙吴户籍结句简中的“事”》为题，收入《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144—162页。

② 图版见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牒》，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释文见彭浩：《读松柏出土的西汉木牒（二）》，2009年4月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13，2013年5月6日。

外，安徽天长出土的西汉中期某县《户口簿》、^① 朝鲜平壤贞柏洞出土的《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集簿》以及江苏尹湾汉墓出土的《集簿》^② 中也有诸如“多前”“少前”“如前”等统计。这些数据只能解释为当年相比上一年的户口增减情况，不可能是来年的预计情况。里耶秦简中也有县署向上级呈报户计的实例：

卅四年十月戊戌朔辛丑，迁陵守[丞]说敢言之：上卅三年黔首息耗八牒。敢言之。
(简 8—183+8—290+8—530)^③

此时十月为岁首，戊戌朔，辛丑是四日。这是第二年年初呈报上一年户计的例子，而西林昭一披露了一枚长沙走马楼汉简：

五年九月丙辰朔壬申，都乡胜敢言之，狱移劾曰：复移五年计□口四千二百廿七，案阅实四千二百七十四，其卅九口计后。^④

胡平生指出，这里的“五年”应是长沙王纪年，大致相当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⑤ 丙辰朔，壬申是 17 日。这两个例子中，迁陵县秦始皇三十四年年初呈报的是三十三年户计，长沙县都乡五年年底呈报的是“五年计”，并非我原来推想的来年即“三十四年计”或“六年计”。

明白官方著籍增年的做法后，就能澄清所谓预计的问题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到汉武帝改定太初历这段时期，十月为岁首，编定户籍又在岁末，两者首尾衔接，很容易给人以预先造籍的假象；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是这一时期官府登记、确认民众年龄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晚了将近一年。^⑥ 也正因为秦汉户籍中的年龄是以当年八月的数据为标准登录的，所以我们在承汉制而来的孙吴户籍类材料中，可以见到诸如“休女弟土年一岁”（简[壹] 7639）、“·鼠弟仕伍□年一岁”（简[貳] 2081）、“悬男侄猗[年]一岁”（简[肆] 518）这些新生婴儿的记载。^⑦

唐代情况就不同了。唐代造籍的标准时间是在正月，但为了能赶上县令正月上旬赴州正式造籍，民户申报手实的工作需要在上一年年末进行。职是之故，唐代为造籍做准备的手实上申报的是来年数据，这就导致这一时期户籍上著录的最小年龄只能是两岁，不可能出现一岁。所

- ①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11 期。简报推测《户口簿》属于东阳县之物，胡平生提出不同意见，参见《天长安乐汉简〈户口簿〉“垣雍”考》，2010 年 2 月 3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15，2013 年 6 月 22 日。
- ②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77—81 页。
- 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 106 页。
- ④ 西林昭一：《简牍名蹟選》2《湖南篇二》，东京：二玄社，2009 年，第 34—35 页。释文参考胡平生：《新出汉简户口簿籍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10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 ⑤ 参见胡平生《新出汉简户口簿籍研究》一文。
- ⑥ 秦及汉初岁首十月，如果当时民间也以十月增岁，官方年龄就比民间年龄差了整整一岁。
- ⑦ 参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052 页；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759 页；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632 页。

以我们在唐代户籍中,可以见到许多登载两岁的例子;^①但没有一例一岁者。如果这一现象尚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唐代户籍中登录的“四岁”年龄的注记,《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程智意”户:

185 女妙光载肆岁 小女 天宝三载籍后附空^②

《唐开元四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索住洛”户:

35 男仁惠年肆岁 小男 先天貳年帐后新生附^③

《唐开元四年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第2片不知名户:

7 女修成年肆岁 小女 先天貳年帐后新生附^④

《唐开元廿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户籍》不知名户:

4 男惠一年肆岁 小男开元貳拾陆年帐后新生附^⑤

先天二年(713)干支癸丑,是造籍年,目前也发现了这一年的户籍实物。^⑥但从开元二十三年(735)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造籍年次(寅、巳、申、亥);开元二十六年干支戊寅,也是造籍年。^⑦所以,文书注称的“先天二年(开元二十六)帐后”也就是“先天二年(开元二十六)籍后”。^⑧户籍注记有严格的书写规范,凡作“籍后漏附”指未在规定的造籍之年登录,前籍有脱漏者;而作“籍后附”则指新生儿在造籍之年的正常登录。^⑨唐代三年一造籍,四岁均注“籍后附”或径作“新生附”,亦可反证唐代户籍不可能登录一岁之事实。

汉唐造籍日期的变化,固然是因应民间习俗的做法,也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结果。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因应黄河流域主谷的收获时间,官府采用“计断九月”之制;为了能及时而准确地掌握户口数据并将其记入当年的计簿中,编造户籍的时间只能放在八、九月。随着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央制定政策的倾向性的变化,南朝以后财政年度“岁终为断”,转

① 如在《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我们就可以在“郑恩养”、“程思楚”、“程什住”、“程大忠”、“程大庆”、“程智意”以及某不知名户等7户内见到登载两岁的情况;“程思楚”户内甚至有两例。(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60—181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181页。

③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02页。

④ T. Yamamoto and Y. Dohi, eds.,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A) Introduction & Texts, p. 31. 原文书整理者将其定名为“《唐开元二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4),第128页。

⑤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图版,第227页;“附录”,第29页。

⑥ P. 2822号《唐先天二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135—137页。

⑦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⑧ 池田温指出,敦煌与吐鲁番户籍的书式有所不同:“沙州(敦煌)于造籍之年,在户口异动注记中写作‘某年籍后’,其他则记为‘某年帐后’;相反,西州(吐鲁番)则全部使用‘某年帐后’。”(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95页)

⑨ 也有一个特例,《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第3片第67行:“忠男元奉载叁(三)岁 黄男天宝四载帐后漏附空”。元奉3岁本是新生儿新附,却被注为“漏附”。但如果对照本件第63行“女妃妃载叁岁 黄女天宝四载帐后附空”的记载,就可以确定第67行的“漏附”是误书。事实上,此“漏”字旁边有一墨点,看来校籍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错误。

而采用自然年度。^①但唐代甚或此前为什么没有在同为财政年度之末的十一、十二月造籍而是改为正月造籍呢？除了民间增年节点的影响，至少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赋税制度的变化。秦汉时期基于人身的口、算赋是每月征收，^②而魏晋时期租调制确立之后，以绢帛粟米为代表的实物都是在特定时间段征收，^③所以这一时期的户籍不必局限于上一财政年度末，只要在赋税征收前造好就可以了。二是户籍功能的变化。秦汉时期的户籍是每年一造，户籍直接为征收赋役提供依据；有迹象表明，至少南朝时期户籍就开始三年一造，户籍作为政府掌握的基础台帐，征收赋役有专门的帐簿。^④这些方面的变化，为唐代甚或前朝的造籍日期以及相应官方增年时间节点的转变提供了可能。

结 语

中国古代尤其中古时期，不存在周岁计年的方式，但有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区别。我们以往谈到官方年龄时，会不自觉地将其与民间年龄等同起来，认为如果没有民众弄虚作假或官吏上下其手，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应该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是两种不同的计年方式，两者的分合也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由于官府掌握的户籍中的年龄原则上是由民众自行申报，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在始生计数（增年起点）上一样，但在增年的时间节点上有很大差异。最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民间年龄就固定以岁首元日增年，每过一个春节增一岁。但官方年龄不同，按照户籍制度的设计，其是以民众每年的著籍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官府造籍的标准时间为增年的节点。秦汉时期，官府造籍标准时间在八月，官方年龄的增年时间节点也在八月。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及汉初的人说“岁尽增年”以及睡虎地秦简、《续汉书·礼仪志》谓八月著籍才是官府认可的课役（优免）身份的起点了，由此也就能更好地把握秦汉户籍上登录的年龄数据的真实涵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调整，最迟到唐代，官府造籍的标准时间确定在了正月。在非造籍年，唐代民众可以正常在正月申报手实；而到造籍年，为了能赶上官府制作户籍的时间，需要提前在上一年年末预报手实。这就可以解释唐代户籍中为什么登载的最小年龄是两岁，没有一岁的现象了。探讨官方年龄及增年时间节点的演变，就成为我们观察中古户籍制度的一个新视角。唐代造籍标准时间的调整，使官方与民间的增年时间节点合二为一，从而改变了以前官方年龄较诸民间年龄“慢一拍”的弊端；这种调整不仅是古代造籍制度的一大变化，也是统治者日益强化对民众控制的必然结果。

〔作者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张云华 赵晨昕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参见前揭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一文。

② 学者对此已多有揭示，最新研究成果参见张荣强：《再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以结计简为中心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③ 《通典》卷6《食货六·赋税下》对唐代征收租庸调的时间有详细规定：庸调在八、九月征收；租粟“准州土收获早晚”，大约在七、八月征收；“稻麦随熟即输”，水稻十月成熟，小麦五月成熟，民众最早交租税的时间也要在五月之后。（《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9页）

④ 参见前揭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一文。

gained strength, and even sought to find its way back to the upper strata.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breaking through theocracy; a return to religious theology; and the reemergence of scientific reason. The Five Cyclic Virtues theor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long process. In line with the open-closed-open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form taken by the transfer of rule, a form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theory of the Five Cyclic Virtues, also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revolution, abdication and national unity.

From “Coun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Year” to “Coun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Evolution of the Official Method of Counting Age in Middle Antiquity in China Zhang Rongqiang(51)

In ancient China, particularly in middle antiquity,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popular way of counting age lay in when one became a year older. From the tim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t the latest, popular custom regarded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i.e. the lunar Spring Festival, as the point at which one was a year older.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g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used the standard tim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e. the time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registered the household) a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person concerned was a year older. In the “Biography of Cang Gong” (Chunyu Yi) in the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hunyu Yi states that he was 39 years old at the end of the 3rd Year of Emperor Wen of Han, and Qin bamboo slip No. 0552 at the Yuelu Academy records that Shuang was 23 years old by the end of the 26th Year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These are all examples ages calculated by the official method. But since the standard registration time varied, the point of time officially used to add age increments also vari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were compiled in August, so one officially became a year older in August. Under the Tang, the populace had to submit their “household information for the coming year” in advanc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previous to the year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would carry ou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o the standard registration time was actually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year. From the Tang Dynasty at the latest, the official way of counting age wa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lunar year, finally bringing together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folk custom.

China’s Treaty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Late Qing Law Li Yumin(68)

The establishmen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Opium War broke down China’s unitary legal system and thus became a basic factor in changes in late Qing la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y stipulations and domestic law as the two transformed each other was a special kind of legal change with a marked semi-colonial character, but it did at the same time serve to some extent as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Some slight revisions in the *Great Qing Legal Code* reflect the twofold influence of the backwardness of Qing legal reform and the effect of treaty relations on late Qing law. Although the long discarded *bayi* (Eight Deliberations) law was reintroduced, its mission ultimately vanished from Chinese legal history. Treaty relations forced China to learn from and absorb Western law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elatively complete modern legal system that “was vali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t the same